

January 1934

梁啟超的南北文化觀

Xujing CHEN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

 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陳序經(1934)。梁啟超的南北文化觀。《嶺南學報》，3(3)，26-43。檢自：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ljcs_1929/vol3/iss3/4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(Guangzhou)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(1929-1952)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第二章

梁啓超的南北文化觀

近代研究所謂南北文化的發展和差異，較爲詳細而影響於思想界較大者，恐怕要算梁任公了。

梁氏關於此種研究的論文，比較重要的有下列四篇。

- (一) 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
- (二) 中國地理大勢論
- (三) 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
- (四) 清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。

第一篇陸續發表於光緒二十八年(1902)的新民叢報（參看第五號起），後來又改爲中國古代思潮（參看商務書館所印行的國學叢書）。第二篇也陸續發表於新民叢報（從第六號起），第三篇約發表於光緒三十年？(1904?)，第四篇登載於民國十三年的清華學報第一卷第二期。

第一篇是一篇很長的文章，其實是預寫的一本書。但是這篇文章所研究的對象，是偏於思想方面，而對於南北思想的研究，是見於第二章的第二節。第二篇所研究的範圍較廣，包括政治，兵事，哲學，經學，佛學，詞章，美術，音樂，及風俗等。而且這篇所研究的時代，是從上古至晚清。第三篇說明廣東在近代中國及在世界上的位置，而特別注重於地理上的東西文化的溝通。第四篇是研究清代學者的地理的分佈，在範圍上既狹，在時代上也是很短的。

這四篇文章裏最重要的，要算第二和第三篇。第一和第四篇，可以說是第二篇裏所研究的對象的部分。所以從發表的時間上看去，清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一篇雖寫於其他三篇之後二十年，然從性質上看去，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却和其他三者有了特殊的不同。

梁氏以爲南北文化的不同，根本上是由於地理的各異；而所謂地理，又是重要的指着河流。他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裏說：

「文明之發生，莫要於河流；中國者，富於河流之名國也。就本部而三分之，復可爲中，南，北三部。北部者，黃河流域也，中部者，揚子江流域也，南部者，西江流域也。三者之發達，先後不同，而其間民族之性質，亦自差異，此亦有原理焉。凡河流之南北向者，則能連寒溫熱三帶之地而一貫之，使種種之氣候，種種之物產，種種之人情，互相調和，而利害不至於衝突。河流之向東西者反是，所經之區，同一氣候，同一物產，同一人情。故此河流與彼河流之間，往往各爲風氣。在美國則東西異同，（美國之河流皆自北而南）而常能均調，在中國則南北殊趨，（中國之河皆自西而東）而間其衝突於統一之中，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統者存，皆此之由。」

梁先生雖說文明之發生和差異，是因河流的不同，然在上面一段話裡，還提及氣候物產的重要，所以河流在文化的差異和調和上，固有很大的意義；氣候物產於文化的關係，也很密切。因此他以爲中國南北文化的現象的不同，是由於地理上的氣候河流等等的作用。他在中國古代思潮一文裡說：

「凡人群第一期之進化，必依河流而起，此萬國之所同也。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，其位置性質各殊，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，爲獨立發達之觀，雖屢相調和混合，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。凡百皆然，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。北地苦寒磽瘠，謀生不易，其民族銷磨精神日力，以奔走衣食，維持社會，猶恐不給，無餘裕以馳騖於玄妙之哲理，故其學術思想，常務實際，切人事，貴力行，重經驗；而修身齊家，治國利群之道

術最發達焉。惟然，故重家族，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。敬老年，尊先祖，隨而崇古之念重，保守之情深，排外之力強，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，外夷狄，重禮文，繫親法，守法律，畏天命，此北學之精神也。南地則反是，其氣候和；其土地饒，其謀生易，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憂；故常觀於世界以外，初而輕世，既而玩世，既而厭世，不屑屑於實際；故不重禮法，不拘拘於經驗，故不崇先王。又其發達較遲，中原之人，常鄙夷之謂為野蠻，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，有破壞之心，探玄理，出世界，齊物我，平階級，輕私愛，厭繁文，明自然，順本性，此南學之精神也。」

他因此又列表以明其大體的差別

北派宗實際	南派宗虛想
北派主力行	南派主無為
北派貴人事	南派貴出世
北派明政法	南派明哲理
北派重階級	南派重平等
北派重經驗	南派重創造
北派喜保守	南派喜破壞
北派主勉強	南派明自然
北派畏天	南派任天
北派言排外	南派言無我
北派貴自強	南派貴謙弱

上面是說南北思想上的不同。梁氏再從而舉出南北兩派學者的代表人物，他說：

「要之，此全盛時代（春秋戰國時代）之第一期，實以南北兩派

中分天下。北派之魁厥爲孔子，南派之魁厥爲老子。孔學之見排於南，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。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，所至皆見尊崇，乃至宋而畏矣，至陳蔡而阨矣。宋陳蔡皆鄰於南也。及至楚則接輿歌之，丈人揶揄之，長沮桀溺目笑之，無所往而不阻焉；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。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，「孔席不煖，墨突不黔」，栖栖然終其身焉。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，接輿丈人沮溺，皆汲老莊之流者也。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。

「孔老分雄南北，而起於其間者，有墨子焉。墨亦北派也，顧北而稍近於南。墨子生於宋，宋南北要衝也，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採，而自成一家言。其務實際，貴力行也，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，而其刻苦也過之。但其多言天鬼，頗及他界，肇創論法，漸闡哲理，力主兼愛，首倡平等，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。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，以孔老墨三分天下，孔老墨之盛，非徒在第二期而已，直至此時代之終，其餘波及於漢初，猶有鼎足爭雄之姿。」

除了哲理以外，梁氏以爲在經學方面，在兩漢以後，也有南北的分別。他舉出六朝的時代，北人最喜治三禮，像徐遵明劉炫劉焯李鉉劉獻之沈重熊安生們，通通以禮學著名。南人却喜治易，常以易老並稱，如王弼郭象向秀們，均是對於易老做過深刻的研究。這個差別，照梁的意見，也是由於地理不同所生的影響。

同樣佛學也因地理的不同，而有南北的差別。他說：

「隋唐之際，宗風極盛，天台，法相，華嚴三宗，皆起於北；陳義閎深，說法博辯，而修證之法，一務實踐，疏釋之書，動輒汗牛，其學說與北朝經生頗相近似。惟禪宗獨起於南，號稱

教外別傳，達摩入中國首爲梁武所皈依。黃梅大鑑，開山吳越，專憑悟證，不依文字，蓋與老莊陸王，頗符契焉。」

關於詞章他說：

「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，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，自古然也。自唐以前，於詩於文於賦，皆南北各爲家數。長城飲馬，河梁攜手，北人之氣概也。江南草長，洞庭始波，南人之情懷也。散文之長江大河，一瀉千里者，北人爲優。駢文之鏤雲刻月，善移我情者，南人爲優。蓋文章根於性靈，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。」

又如美術音樂，照他的意見，也因南北地理而不同。他說：

「書派之分南北尤顯，北以碑著，南以帖名。南帖爲圓筆之宗，北碑爲方筆之祖。適健雄渾，峻峭方整，北派之所長也。龍門二十品，龔龍顏碑，弔比干文等，爲其代表。秀逸搖曳，含蓄瀟灑，南派之所長也。蘭亭，洛神，淳化閣帖等，爲其代表。蓋雖雕虫小技，而與其社會之人物風氣，皆一一相肖，有如此者，不亦奇哉。畫學亦然，北派擅工筆，南派擅寫意，李將軍之金碧山水，筆格遒勁，北宗之代表也。王摩詰（按王維乃山西太原人）之破墨水石，意象逼真，南派之代表也。音樂亦然，通典云：「祖孝孫以梁陳舊樂，雜用吳楚之音，周隋舊樂，多涉胡戎之技，於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音，而作大唐雅樂，直至今日。而西梆子腔，與南崑曲，一則悲壯，一則靡曼，猶截然南北兩流。由是觀之，大而經濟，心性，倫理之精，小而金石，刻畫，遊戲之末，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密切之關係。天然力量之影響於人事者，不亦偉耶！不亦偉耶！」

梁氏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裡把上面所說的哲理，經學，佛學，詞

章，字法，雕刻，圖畫，音樂等，包括於文學之內。而所謂「文學地理」上的差別——照他的意見——是常隨「政治地理」上的差別為轉移。因此政治上的南北的不同，又為他所特別注重。他說：

「其在政治，北方視南方（自注：以下所言南方皆指揚子江流域也，非指極南之西江）常占優勢。蓋我黃族之始祖，本自帕米爾高原迤邐東下，而揚子江上流，崇巒峻嶺，壁立障之，故避難就易，沿河以趨。全國文明，自黃河起點，而傳佈於西方。帝王實力，亦起於是；積之者厚，故其勢至今猶昌也。」

所謂政治上的北方常占優勢於南方，據梁的意見，可把歷代帝王的都城來證明。他因此列了黃河流域國都，和揚子江流域國都兩個表；前者始於三皇而至清代，後者始於三國的吳而至明代。他的結論是：

「北方宅都時代，而南方無他都者垂二千餘年；其南方宅都時代，而北方無他都者，惟明太祖建文共二十五年耳。」

又說：

「數千年王霸之國都，其在黃河流域者十六，得姓三十六；其在揚子江流域者二，得姓十；其準黃河流域者一，（北京）得姓四；其準揚子江流域者三，（成都臨安湖南）得姓六；其不在兩流域內者五，得姓七。數千年政治都會，畧具於是矣。」

因此之故，政治的中心地方簡直可以說是黃河流域，換句來說，就是北方。

國都固以北方為中心地點，兵事也是這樣。因此他又列出一個歷代革命軍及割據所憑藉的地理表，表裡所根據以研究的，自秦末陳勝吳廣之揭竿舉事，而至義和團，共一百一十五次，除了好幾次是異族起兵異域入主中國不算外，則統計所表示各省主動多少的數目如

下：

<u>直隸</u> 十五	<u>山西</u> 八	<u>福建</u> 四	<u>雲南</u> 一
<u>甘肅</u> 十三	<u>湖北</u> 七	<u>陝西</u> 三	<u>江西</u> 一
<u>江蘇</u> 十一	<u>四川</u> 七	<u>湖南</u> 三	<u>貴州</u> 一
<u>山東</u> 十	<u>河南</u> 五	<u>廣東</u> 三	
<u>安徽</u> 九	<u>浙江</u> 四	<u>廣西</u> 一	

他以爲這些地方之所以用兵的原因雖很多，然地理上的作用，却是重要主因之一。從上面的表來看，除了直隸甘肅山西三個地方多由西北異種乘藉竊據，其主動不專由漢族外，地理上最合於用兵的地点，要算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湖北諸省。這個原故，是因爲這些地方都是位於黃河長江兩流域，因此可知江河之於政治的兵事的關係的密切。

此外他再從南北地理的不同，而舉出風俗上的不同。他說：

「其在風俗則北俊南嬾，北蕭南舒，北強南秀，北儻南華，其大較也。龔定菴詩云：「黃河女直徙南東，我說神功勝禹功；安用迂儒談故道，犁然天地劃民風。」自注云：渡河而南，天色異，地氣異，民情異，蓋南北之差殊，稍有識者皆能見及矣。」

他又從古書上而特別是史記貨殖傳中所載南北風俗的差異，摘錄出來，以證明南北風俗的不同，是由於地理的不同。

在梁氏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佈一文，梁氏把清代四百六十一位學者來做研究的對象，而尋出他們在地理上的分佈。這個研究雖只限於一代和學者，但是學者也是文化上一種重要元素，而從其地理上的分佈也能看出他們在南北文化中的位置。依梁氏研究所得，在這一個時代裡，學者最多的地方，首推江蘇，次爲浙江，再次是河北，安徽，廣東，湖南，河南，陝西，江西，福建，山西，四川；……把各省的人物(學者)來比較，其人數百分比及等級則得到下面一個表：

梁氏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表

(參看朱君毅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頁十四)

省 分	人 數	百 分 比	等 級
江 蘇	121	26.24%	1
浙 江	90	19.52%	2
河 北	42	9.33	3
安 徽	41	8.89	4
廣 東	24	5.21	5.5
湖 南	24	5.21	5.5
山 東	22	4.77	7
河 南	19	4.12	8
陝 西	16	3.47	9.5
江 西	16	3.47	9.5
福 建	12	2.60	11
山 西	7	1.52	12
四 川	6	1.30	13
湖 北	5	1.08	14.5
貴 州	5	1.08	14.5
廣 西	4	.86	16
蒙 滿	3	.65	17
雲 南	1	.22	18
遼 寧	1	.22	19
甘 肅	1	.22	19
總 數	461	99.98	19

上面是解釋梁氏對於南北文化各方面的差別的意見，現在且來談談他對於中國文化發展的趨向的觀念。

梁氏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裏說：

「自周以前，以黃河流域爲全國之代表，自漢以後，以黃河揚子江兩流域爲全國之代表，近百年來以黃河揚子江西江三流域爲全國之代表。穹古之事，不可紀，今後之局，猶未來。然則過去歷史之大部分，實不外黃河揚子江兩民族競爭之舞臺也。前者西江未發達，故通稱中部爲南部。數千年南北相競之大勢即中國歷史之榮光，亦中國地理之骨相也。」

他又說：

「大抵中國地理開化之次第，自北而南；三代以前，河北極盛，秦漢之間，移於河南，寢移於江北，六朝以後，江南亦駸駸代興焉。而自漢迄今，全史之大部分，皆演於江河間之原野。彼龍拏虎擲，甲興乙仆，殆未有出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北數省外者也。惟漢民族之在中國，其猶近世條頓民族之在世界也。而點綴其間者，則有幽燕趙代隴蜀諸族，其猶歐洲之有拉丁與斯拉夫也。此外位其南者，未嘗有能爲一國之輕重者也，其有之則自近百數十年始也。」

南北文化的差異，既是由南北地理的不同而來，而中國文化之由北而趨於南，也是由於地理上的作用。因爲地理上的不同，所以在歷史上差不多只見北人治南，沒有多見南人治北。他說：

「歷覽前史，大抵北人南伐者則得志，南人北伐者則不得志。其在北者，如五胡起而晉以東，金遼起而宋以南，蒙古起而宋金夷，滿洲起而明社屋。此皆外種憑藉異域，姑勿具論。劉項同爲淮人，而漢踞關中巴蜀，楚踞江淮，成功卒歸劉氏。三

國鼎立，而吳入於晉；六朝並峙，而陳入於隋。自古南渡偏安之局，曾無一焉能北進以恢復者。（幸陝幸蜀者有恢復，渡江者無恢復，其故可思也。）不可謂非地理上一疑問焉。北伐之師，惟項羽以江東八千破秦，孫堅以吳會一旅入洛，最稱名譽，然卒歸於敗衄。爾後劉裕之滅南燕，滅後秦，號稱南朝，第一盛舉，亦不能竟其功。此外南北交戰，南人之有功者，千餘年來不過三役，一曰周瑜之於赤壁，二曰謝玄之於淝水，三曰虞允文之於采石。然皆防禦而已，於進取則概乎未之有聞也。豈徒南人文弱之爲哉，毋亦地勢地運使然矣。直至明祖用江淮之衆，放逐胡元於漠北，光復舊物，混一海內，南之挫北，蓋自茲役始。明祖雖暴，其爲漢族之名譽，又烏可誣也。而考地理與歷史之進化相關係者，亦可於此思其故矣。

過去的南方，固是無足輕重，但是未來的南方，却是逐漸的趨於重要的位置。且看他說：

『自唐以前，湖南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諸省，曾未嘗一爲輕重於大局。（項羽雖起於會稽，其根據地不在此）自宋以後，而大事日出於此間矣。宋之南渡在浙，其亡也在廣東；明之亡也，始而江，繼而浙而閩而粵而滇而桂，此亦地運由黃河揚子江而趨於西江之明徵也。湘中古之南楚，號稱大國，而二千年間用之者惟一蕭銑一馬殷。乃咸同以來，曾胡驟起，湘軍之聲譽，東至東海，南踰嶺南，西關西部，西南震苗疆，至今尚炙手可熱。三湘民族之有大影響於全國，實自五十年以來也。兩廣亦然，曠昔惟有尉佗劉隱等諸羈縻，及洪楊發難，乃裹五嶺之民，凌厲蹴踏，奄半天下者垂十餘年。兩廣民族之大有影響於全國，亦自五十年以來也。浙人閩人於明末魯唐監國時代，崎嶇

海上，奔走國難者，號稱極盛。浙閩民族之大有影響於全國，亦自二百年以來也。自今以往，而西江流域之發達，日以益進，他日龍拏虎擲之大業，將不在黃河與揚子江間之原野，而在揚子江與西江之原野。此又以進化自然之運推測之，而可以知其概者也。」

他又說：

「粵西江流域也，黃河揚子江開化既久，華實燦爛，而吾粵乃今始萌芽，故數千年來未有大關係於中原。雖然，粵人者，中國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；其言語異，其習尚異，其握大江之下流，而吸其菁華也，與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勝，而支流之紛錯過之。其兩面環海，海岸線與幅員比較，其長率爲各省之冠。其與海外各國交通，爲歐羅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亞三洲之孔道。五嶺亘其北，以界於中原，故廣東包廣西而以自捍，亦政治一獨立區域也。他日中國如有聯邦分治之事乎，吾知爲天下倡者，必此兩隅也。」

他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裡，劈頭就說，從中國史上看去，廣東可以說是沒有絲毫的價值。百年以前，沒有出過一位人物，足爲全國的輕重，也沒有人把她來做主動，而使全國生出很大的影響。所以從中國史上看去，廣東簡是像鷄肋一樣。但是廣東的位置，却並不因此而失其重要：因爲廣東正如上面所說，是有特殊的民族，吸了中國的菁華，而又是中外交通上的孔道，因爲她是中外交通的孔道，所以她在世界史上，却佔了很重要的位置。他說：

「論泰西古代史者，必以腓尼西亞 Phoenicia 占一重要之位置，謂其爲小亞細亞埃及希臘三種文明之媒介也。求諸東方，則廣東庶幾近之？」

所謂中外交通的孔道，就是中外文化接觸和傳播的媒介。西方文化之輸入中國，固以廣東為起點，中國文化之輸出也，亦以廣東為起點。他說：

「羅盤針也，火藥及火器也，製紙法及印刷術也，此三者為西人致富強之原，然皆由十字軍東征時，經阿剌伯人手，間接傳自東國者。阿剌伯人至中國者，以廣東為第二故鄉，則此三物第一之販賣場，實廣東也。又蠶卵一物，我梁簡文帝大寶元年，（五五〇年）一波斯人由廣東携歸康士但丁，西方之有絲產始此。又陶器由廣東人精製後，更大輸出於泰西。至西紀一七零七年，德國名匠勃查 Pottoger 苦心研究，終青於藍。而中國派之繪畫美術，亦緣此以渡被於歐洲。凡此皆廣東人對於世界文化之貢獻也。」

關於西方文化之從廣東而輸入的，他分為二類；一是宗教，一是學術。屬於前者，像回教，佛教，及耶蘇教的景教，舊教，及新教；屬於後者，他以為曆算是由利瑪竇的輸傳，而利氏的修養，全在廣東。此外米侖氏 Milne的英華書字之在言語方面的貢獻，以及醫學上的博濟醫院，以至科學方面像道光間所刊行的博物新編等，均是在廣東。至於十九世紀的晚年，所謂西洋技術思想的介紹，均以廣東為起點。

此外又如廣東人的海外事業的發展，也足以證明廣東位置的重要。從歷史上看去，六朝李唐時的商船的遠出，達於紅海，明季以來，廣東人之冒萬險犯萬難而卒為南洋諸國之酋長者，也不乏人。而且在南洋的經濟權，多半操於粵人之手，同時粵人之移殖於美洲者，也與日增長。這些事實，均足證明廣東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重要。

從上面的研究，遂得到下面的結論：

「今之廣東，依然為世界交通第一等孔道，如唐宋時，航路四

接，輪橋充闢，歐洲線，澳洲線，北美洲線，皆集中於此。香港船噸入口之盛，雖利物浦紐約馬賽不能過也。若其對於本國，則自我沿海海運發達以後，其位置既一變，再越數年，蘆粵漢鐵路線接續，其位置將又一變。廣東非徒重於世界，抑亦重於國中矣。」

我們不厭繁瑣來摘錄原文，介紹梁氏的南北文化觀，不外是因爲梁氏對於這個題目的研究，不但是在他以前，就是在他以後，以至現在，恐怕要算最爲詳細，而且較爲透澈。一般的人們，對於這個問題，只做了片斷的觀察，他却把她來做整個解釋。一般的人們的研究大概是限於一個時代，或是限於文化的一方面，他却努力的把整個歷史和全部的文化，來做研究的對象。所以在南北文化的研究的歷史上看去，梁氏所佔的位置，是不能忽略。

但是這種同情，却不是說梁氏的見解是沒有錯誤的。其實他的南北文化觀的缺點是很多的。我們因爲篇幅上的關係，這裡只將其重要的缺點，指摘出來。

梁先生所說的南北，大致是指着黃河和揚子江。我們縱覽中國疆土歷史，春秋戰國以前的揚子江，既尙未入於中國文化的範圍，而秦漢以後的中國版土，却已包括西江流域。所以揚子江流域。已逐漸的變爲中國的中部，而非中國的南部。梁先生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裡，也曾聲明他所說的南方，是指揚子江流域而非西江流域。這一種的南北文化觀，只能說是中國的局部的南北文化，不能說是中國的全部南北文化觀。我們所研究的對象，是整個中國，對於這種局部的南北，當然是嫌其太過狹小。因爲設使我們而以黃河流域爲北方，揚子江流域爲南方，那麼我們也可以把揚子江流域爲北方，而以西江流域爲南方。南北這兩個字是相對的，一省一縣，以至一鄉一戶，都有南北之分

，只要看看我們所研究的範圍而定。要是我們所研究的範圍，是中北兩部，那麼以長江爲南，黃河爲北，未嘗不可。要是我們所研究的範圍，是整個中國，那麼照梁先生之以黃河爲北，長江爲南，未免有了名不符實的毛病。

梁先生也許說道，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的版圖，的確是不出黃河長江兩流域，所以從這個時代來看，黃河流域是中國的北，而長江是中國的南。這麼一來，那麼梁先生的研究的對象，又不外是只限於一個時代——一個很短的時代了。春秋以前的揚子江既尚被視爲野蠻沒有開化的地方，秦漢以後的揚子江，又變成中國的中部，而且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，是由過去數千年的文化累進而來，這數百年間，因政治上的紊亂，和思想上的開放，固有可以影響到文化的全部可能性。然事實上這種影響，是否使中國在這時期的文化，起了重大的變化，同時是否使南北的文化，因之差異，均是疑問。

梁先生研究春秋戰國時代的南北文化的不同的重要點，是思想方面。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，除了思想方面，稍背故軌而畧放異彩外，恐怕沒有別的可紀。但是連了思想方面的南北的不同，像梁先生所說，未免過於鋪張。梁先生表中所列出十一種的異處，好像是很爲勉強，所謂北派崇實際，南派崇虛思等等，既不外是一種意象的分別，而一方面說南派貴出世，一方面又說南派重創造，簡直是像自己打着自己的嘴一樣。要是南派是貴出世，當然是不會重創造；要是重了創造，又怎能貴出世？又豈不是具有了北派的貴自強，貴人事，主力行那些特性嗎？

同樣他把孔子來做北派的代表，老子來做南派的代表，而以爲兩者的差異，是由於地理不同的影響，尤爲我們所不敢贊同。近來有些日本學者以爲老子乃北方人，而非楚苦縣人，要是這種學說是對，那麼

梁先生的南北思想的不同，是由於南方的老子和北方的孔子所處的環境的不同，可以不攻自破。事實上梁先生在墨子學案裏也以爲老子爲北人。何況孔子是老子的弟子，所謂北派代表的孔子的思想，也就是從所謂南派代表的老子的思想而來；這麼一來，北派的思想就是南派的思想，而南派的思想，也就是北派的思想。梁先生也許否認孔子爲老子之弟子的說，（梁先生以爲老子生在孔子之後）然而在梁先生未證明禮記的曾子問，史記老子傳，仲尼弟子列傳，莊子天下篇，呂氏春秋當染篇，孔子家語觀周篇，五帝篇，和執轡篇等是假造之前，梁先生怎能說孔子沒有師事過老子呢。不但這樣，從孔子和老子的根本思想來看，兩者並非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孔子所謂「吾道一以貫之，」正像老子所謂「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……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。」根本相同。老子說明道若昧，孔子也說君子之道闇而日章。孔子所說天無言而四時行，百物產，正是老子所說行不言之教。孔子之贊美舜的無爲之治，正是老子無爲而無不爲的真諦。孔子反對繁雜的物質生活，正是老子的根本主張。老子以爲歷史的演化是日趨日下，而主張復古，孔子也是這樣。總而言之，從部分和方法方面來說，他們雖有不少的差異，然根本思想上，特別是文化的道德方面却是沒有種類的分別；根本他們既是類同那，麼孔老爲北派南派思想的代表的見解，當然是錯誤了。

梁先生解釋南北文化的差異，最精彩的地方，要算春秋戰國的思想方面；這方面既是錯誤，他方面更不待說。比方他以爲六朝時的經學，也有南北之分，然而同時他又承認兩漢以後儒學統一，打破了先秦學術的南北的界域。此外關於佛學詞章各方面的南北的不同，均是枝節，而沒有多大的意義。至於他所說的政治和兵事上的北勝於南，不過是據歷史的事實而求結論，並非說明南北政治和兵事本身上的不同。

其實梁先生自己也很明白的承認中國的文化是統一的，而沒有南北的分別，他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裡說：

「中國者，天然一統之大國也。人種一統，言語一統，文學一統，教義一統，風俗一統，而其根原莫不由於地勢。中國所以遜於泰西者在此，中國所以優於泰西者亦在此。」

所謂言語，文學，教義，風俗，都是文化的主要特性；這些東西既是一統，自然沒有南北之分。那麼梁先生所謂南北文化的不同，又豈不是自相矛盾嗎？梁先生在同文裡又說：

「大抵自唐以前，南北之界最甚，唐後則漸微。蓋文學地理（包括哲學，思想，佛教，詞章，美術，音樂）常隨政治地理為轉移。自縱流之運河既通，兩流域之形勢日相接近，天下益日趨於統一。而唐代君臣上下，復努力以聯貫之；貞觀之初，孔穎達顏師古等奉詔撰五經正義，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，祖孝孫之定樂，亦其一端也。文家之韓柳，詩家之李杜，皆生江河兩域之間，思起八代之衰，成一家之言。書家如歐虞褚李顏柳之徒，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長，獨開生面。蓋調和南北之功，以唐為最矣。由此言之，天行之力雖偉，而人治恆足以相勝。今日輪船鐵路之力，且將使東西五洲合一爐而公冶之矣，而竟何區區南北之足云也。」

梁先生在中國古代思潮一文裡，分為全盛時代，（周秦）儒學統一時代，（兩漢）老學時代，（三國六朝）佛學時代（南北朝）。除了全盛時代以孔老為北派南派的分歧外，所謂儒學老學佛學的統一，明明白白承認在這些時代裡，沒有南北之分。現在他又指出自唐以後，南北的界域日趨調和一統，可知大致和根本上「中國」的文化是沒有南北之分的。就使我們相信上面所錄梁氏那段話，所說自唐以前，南北之界最

甚；那麼這種南北界域，仍不外是歷史上一種已往的陳迹；從現在的眼光看去，只有了歷史上的研究的價值，對於現在或將來的中國的文化的前途上，沒有重大的意義。

根本上我們既不贊成梁先生把長江流域，和黃河流域來代表中國的南北文化，事實上這兩個流域的文化的本身上，又沒有根本不同的地方；就是有了，也不外是枝節的分別，和歷史的價值。

梁先生此外以為中國文化的發展，是由北而南，從中國本部來說，我們大體上可以表同情於梁氏。然從歷史上看去，中國固有的文化，不但是由北而南，而且是由南而北，和由西而東。中國文化最初發見於中國西部的甘肅，此後沿着黃河而向東發展，所以由西而東，也是很明顯的。同樣中國的文化，是最初盛於黃河，後來且向蒙古滿洲而發展，這又可以說是由南而北了。

照梁先生的意見，中國文化雖是由北而南，而中國極南的文化之占中國重要的位置，却是最近百年左右的事，然他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裡，已覺到廣東在近來中國文化的位置的重要。他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，更說出廣東是中西文化接觸的媒介。由廣東而輸出的中國文化，到西方去，是屬於東西文化的接觸問題，我們這裡可以不必提及。由廣東而輸入的西洋文化，却對於南北文化上——從我們的見解來說——本來是很重要的，可惜梁氏對於這點，又沒有明白的解釋和表示。總而言之，梁氏對於廣東在世界上東西文化的媒介上，雖覺得很重要，然於中國的南北文化的位置，好像沒有充分的認識。這個原故，大約是由他對於南北文化的界域的研究，是偏於黃河和長江兩個流域，而同時又覺得廣東一地，在百年以前的中國史上，完全沒有絲毫的價值，結果是連了他所舉出歷史上——二百年前的歷史的東西文化的媒介的廣東的位置，從國史上觀察，也像雞肋一樣。他雖然推料

將來的廣東在中國必佔重要的位置，然而他好像忘記了過去的廣東之在世界上的位置的重要，也就是在中國的位置的重要。質言之，他一方面把世界和中國分做兩種，好像沒有相關的東西，一方面又以爲中國的南北就是黃河長江兩流域的南北。所以真正的中國南方，却置諸他的南北範圍之外，而他的南北文化的範圍，（黃河長江兩流域）和差異，（孔老的不同）又築在理論而沒有充足事實無可取證的基礎上。結果是使他的南北文化觀，免不了錯誤，免不了缺點。

梁氏雖然說過天行之力雖偉，而人治恒足以相勝。但是從上面所舉出數篇文章裡，他處處都很相信南北文化的差異，是由於南北地理——河流與氣候——的差異而來。我們以爲在文化很低下的社會，所謂地理上的勢力影響雖顯明，但是在文化較高的社會，則這種勢力的影響，已逐漸微弱。梁氏對於這點好像沒有充分的了解，所以他的解釋未免過偏，而他的意見也未免陷於錯誤。

此外關於梁氏的南北文化觀之可批評者尚不止此，我們只可從略罷。